

中国

新文学大系

1927—1937

第十五集

上海文艺出版社编

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1927—1937

In 20 volumes

VOLUME XV: DRAMA—Part I

Preface by Yu Ling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ress, 1985

Shanghai, China

中国新文学大系

1927—1937 第十五集 戏剧集一

于 伶 序

编辑、出版：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绍兴路74号)

发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刷： 上海新华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5.75 插页 6 字数 565,000

1985年12月第1版 1985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0 册

书号：10078·3519 定价：6.30 元

戏剧集一

于伶序

序

于伶

中国的话剧运动最早应从晚清算起。“五四”时期，即新文学运动的第一个十年，是中国话剧运动的童年时期。到了新文学运动的第二个十年，即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可说是中国话剧运动的青年时期。这时期话剧的数量和质量都有重大的发展，涌现了一大批著名的剧作家、导演和演员。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光明的中国又成了黑暗的中国。许多战斗在革命战争第一线的文化工作者，这时回到了全国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的上海，继续从事文化工作；新从国外留学回来或从国内学校里出来的青年，目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仍然统治着中国，就积极投入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活动。这两股力量，构成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革命文化队伍。由于国内革命的需要和国际上左翼文化运动的影响，中国的左翼文化运动在这个时期蓬勃地开展起来。左翼文化运动是当时中国文化运动的主流，但并不是中国唯一的文化运动。它虽然不断受到“左”的干扰，但左翼文化运动的领导者，如鲁迅、瞿秋白、潘汉年、冯雪峰、夏衍、周扬等，在实际工作中仍注意了团结进步文化

力量,因而壮大了进步文化队伍,在社会科学战线和文艺战线取得了重大成绩,并因此而取得了反文化“围剿”的胜利。这时期的戏剧运动(主要指话剧运动)是整个文化运动的重要的一翼。

谈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话剧运动,我首先想到了田汉领导的南国社。南国社成立于一九二四年初,曾办过《南国半月刊》、《南国特刊》,后期又编过《南国月刊》。一九二七年秋,田汉任上海艺术大学文学科主任,接着又被举为校长。作为教学实践活动,他在校内开辟小剧场,举行“艺术鱼龙会”,演出田汉创作的《到何处去》、《公园之夜》、《苏州夜话》、《名优之死》等剧和欧阳予倩编剧的《潘金莲》、译剧《父归》等。一时“小剧场运动”在中国戏剧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一九二八年初,上海艺术大学宣告解散,田汉得到欧阳予倩、徐悲鸿的支持,创办南国艺术学院,设文学、戏剧、绘画三科,学生六十余人,其中如陈白尘、郑君里、赵铭彝、吴作人等,后来都成了艺术界的杰出人才。南国艺院只办了半年,由于政治压迫和经济困难,被迫停办。该院不少学生相依不走,于是重建了南国社。自一九二八年冬至一九二九年底,在田汉率领下,南国社在上海、南京、杭州、广州、无锡等地公演,有力地推动了我国话剧运动的开展。这个时期田汉创作的剧本很多,总的倾向是反帝反封建、不满当时的社会现实、激励人们反抗和斗争的。但那时田汉在剧作中,反映青年的苦闷,揭示种种的社会悲剧时,也常常流露着感伤的情调。田汉后来在《我们的自己批判》(载《南国月刊》一九三〇年四月第二卷第一期)中也承认南国社的戏剧活动中有着“一种无政府主义的颓废的倾向”。他又说:“我们的戏剧也无处不反映着我们的生活,虽说这种生活的基调立在没落的小资产阶级上。”一九二九年七月,田汉连续创作了独幕剧《一致》和三幕剧《火的跳舞》,开

始“丢弃了他的感伤主义”。这两个剧本都可以看出剧作家对于新的世界和新的力量的追求。田汉自己也说：《一致》的发表，“多少可以看见我个人作剧上转变之机”。这也是南国社的转变之机。这年年底，蒋光慈和钱杏邨参加了南国社，使田汉和南国社都进入了左翼戏剧运动。

田汉和南国社在我国戏剧史上的意义远不止于他们活动的本身，而更在于启迪了许许多多的后来者。我自己在一九二六年夏考取在苏州的江苏第一师范以后，田汉的剧作，那富于才思的构架，那富于诗意的语言，简直使我着了迷。我在学校里成了田汉剧作的业余演出者。我练习着编写剧本。从此，我和戏剧结了解之缘。我相信，在后来者中间，接受田汉启蒙教导的决不会只我一人。

在南国社兴盛时期，国内其他戏剧社团也活跃起来。大夏大学的大夏剧社、复旦大学的复旦剧社（洪深领导）、光华大学的光华剧社等等学校剧社先后成立，在校内外演出，剧目有辛克莱的《小偷》、《乞丐与国王》、林语堂的《子见南子》和田汉的作品。一九二九年一月，朱穰丞领导的辛酉剧社成立，演员袁牧之、罗鸣凤等演出了安得烈耶夫的《狗的跳舞》等。这时，欧阳予倩在广东创办戏剧研究所，附设演剧学校，开始时由洪深任校长，教师有唐槐秋、马彦祥、胡春冰等。他们演出多种剧本，其中以演出苏联特列亚柯夫的《怒吼吧中国》最为轰动。停了两年的上海戏剧协社，在应云卫、汪仲贤努力下，又恢复了演出活动。这年冬，南国社成员左明、陈明中、郑君里、陈白尘、赵铭彝、许德佑、吴涓等脱离南国社，另行成立摩登社。他们办了《摩登周刊》、《摩登月刊》，并在各大学剧社协助下，去各大学巡回演出，部分成员还去南通公演，产生了一定影响。这时的话剧运动，已打破了南

国社孤军奋战的局面。

艺术剧社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戏剧运动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第一个公开活动的剧社，它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戏剧”的口号，它成立于一九二九年十一月，由郑伯奇、沈端先（夏衍）主持，成员有冯乃超、沈叶沉（沈西苓）、石凌鹤、许幸之、侯鲁史、司徒慧敏、钱杏邨、孟超、陈波儿、王莹、朱光、刘保罗、龚冰庐、唐晴初等。该社于一九三〇年一月在上海举行第一次公演，演出三个剧目，德国米尔顿的《炭坑夫》，法国罗曼·罗兰的《爱与死的角逐》，美国辛克莱的《梁上君子》（即《小偷》）。同年三月该社在上海又举行第二次公演，演出两个剧目，日本村山知义根据德国雷马克的同名小说改编的《西线无战事》，冯乃超、龚冰庐合编的独幕剧《阿珍》，两次演出都极为成功。艺术剧社还组织了巡回剧队到工厂区演出，其中在沪东游艺会上演出《炭坑夫》、《到明天》，受到工人观众的欢迎。该社还和摩登社联合，去南通演出。艺术剧社的成功大大鼓舞了左翼文艺界，鼓舞了进步戏剧界，同时也引起了反动当局的注目。四月二十八日深夜，上海特别市公安局派出武装警察包围了艺术剧社，进行了野蛮的抄封，并捕去社员四五人（一说八人）。这引起了文艺界的强烈抗议，艺术剧社也因此被迫停止了活动。

艺术剧社虽只公开活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但影响极为深远。它使进步戏剧工作者看到了前进的方向。在艺术剧社被封后不久，南国社演出了田汉根据法国梅里美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卡门》。由俞珊、金焰、宗晖主演，演出很成功。但演到第三天，就为反动当局禁止。这时的辛酉剧社、复旦剧社、戏剧协社等团体也都感到演戏不能只顾演出技巧，而必须注意演出内容。这是整个戏剧界的进步。

一九三〇年三月二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艺术剧社的沈端先（夏衍）、冯乃超、郑伯奇被选为常务委员。戏剧界感到也有联合起来的必要。三月十九日，由艺术剧社、摩登社发起，成立了戏剧界带有行会性质的上海戏剧运动联合会，选出艺术剧社、摩登社、剧艺社（后改称光明剧社）、南国社、辛酉剧社为执行委员，青鸟剧社、戏剧协社、紫歌剧社为监察委员。八月一日，上海戏剧运动联合会改名为中国左翼剧团联盟，选出艺术剧社任总务（相当于书记），辛酉、摩登两社任组织，南国社任宣传，参加者还有戏剧协社、光明剧社、大夏剧社等。左翼剧团联盟成立后，反动派加紧了压迫。不久，南国社被封，演员宗晖被捕并即被杀害。洪深也受到威胁，已无法领导光明剧社。辛酉剧社的主持人朱穰丞出国，该社宣告解散。大夏剧社、摩登社也都无法再开展活动。剧团联盟事实上已只有处于地下状态的艺术剧社和其他各社的个人成员。九月，左翼戏剧界同志酝酿把左翼剧团联盟改组为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由戏剧工作者作为个人成员加入，并草拟了《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最近行动纲领》（见一九三一年十月出版的“左联”机关刊物《文学导报》第六、七期合刊）。纲领共六条，规定了戏剧运动必须深入到工人、农民中去，深入到“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学生群众与小市民”中去；还规定了“对于中国电影运动实有兼顾的必要”，并应“积极组织戏剧讲习班”，提高盟员的水平，“组织电影研究会”，培养电影人才；同时要加强无产阶级戏剧理论的建设，批判反动理论，注意总结中国现阶段戏剧、电影运动的经验教训。这份纲领，可以看出当年左翼戏剧运动的宗旨和努力方向。一九三〇年底，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正式成立，选出刘保罗任总务，赵铭彝任组织，郑君里任宣传，杨邨人任党团书记，杨离沪后，由刘保罗任党团书记；党团

成员有侯鲁史、沈叶沉、谢兆华、曹正、司徒慧敏等。

“剧联”成立后，进步的话剧运动逐渐得到复苏，并不断地发展。在“剧联”的领导下，大道剧社成立。该社成员一百余人，有赵铭彝、刘保罗、郑君里、周伯勳、李尚贤、胡萍、侯枫、谢兆华等等。他们主要在上海各大学公演，也曾一度到嘉兴附近小镇巡回演出，后来也在上海中央大戏院等处公演。它是上海左翼戏剧界有影响的一个剧社。“剧联”还曾组织过蓝衣剧社，主要在沪东、沪西工厂区演出，金山就曾接受组织派遣作为蓝衣剧社的一员，去淞沪铁路机厂演过戏。曙星剧社也是在“剧联”领导下开展活动的，它是《文艺新闻》的演出部，主要成员有袁殊、罗鸣凤、楼适夷等。“剧联”还于一九三二年十月领导成立了春秋剧社。主要成员有王惕渔、田洪、辛汉文、魏鹤龄、舒绣文、朱铭仙等。该社在“戏剧到农村去”的口号下，曾到大场演出，一九三三年夏在上海演出《名优之死》等剧目。一九三三年元旦那天，在“剧联”领导下，成立三三剧社。主要成员有周辉、许可、杜宣等。那时金山、姚时晓等人组织了光光剧社，陈鲤庭等人组织了骆驼剧社。三三、光光、骆驼等剧社经常联合活动，联合演出。曾到工厂学校演出《姐姐》（田汉作）、《丰收》、《腊月二十四》（于伶作）、《谁是朋友》、《放下你的鞭子》（陈鲤庭改编）等剧。一九三三年七月，陈凝秋、赵丹、王为一、徐韬、左明、老陶、周英学、宋之的等成立了新地剧社，除演出话剧外，还表演歌唱和舞蹈。“剧联”还通过个别成员的作用，推动上海话剧运动的发展。当时许多大学恢复或成立了剧团，如大夏大学的大夏剧社、暨南大学的暨南剧社、复旦大学的时代剧社和复旦剧社、上海美术专门学校的美专剧团、劳动大学的新筑剧社和那波剧社、中国公学的中公剧社等等。大道剧社在各大学轮流演出时，就曾得到各大学剧社的支

持和配合。后来各校剧社联合成立了上海学生剧团联合会。东北沦陷后，大道剧社、曙星剧社和上海学生剧团联合成立了上海剧团联合会，举行“反日演剧联合大会”，演出《乱钟》、《血花》、《活路》、《工场夜景》、《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等剧。曾轰动一时，把话剧运动推向抗日爱国斗争的前列。

随着上海左翼文艺运动的兴起，各地的左翼文艺运动也开展起来。一九三二年二月，“剧联”北平分盟成立，执行委员是李树芬（党组织书记）、陶也先（总务部长）、陈沂（组织部长）、宋之的（宣传部长）、于伶（研究部长，不久即调任组织部长），成员有萧之亮、周英学、刘斐章、张季纯、邸力等。在“剧联”分盟领导下，北平先后成立了呵莽（英语“前进”的意思）剧社、苞莉芭（俄语“斗争”的意思）剧社、新球剧社、新兴剧社、北美剧社等。这些剧社除“呵莽”和“苞莉芭”是由“剧联”分盟直接组织的外，其余各社主要由学生组成，除校内演出外，还经常联合起来在社会上公演或流动演出。我当时参加了呵莽剧社，也参加苞莉芭剧社。苞莉芭剧社是北平大学法学院俄文政法系、政经系学生组织的。我和宋之的当时都在这里学习，我们都参加并领导了剧社的活动。一九三二年暑假，“剧联”分盟领导下的几个剧社曾远征塞外，到绥远的省城归绥作宣传演出。我同时在当地的学生与新闻工作者中间，与北平“剧联”分盟的邸力一道组织了反帝大同盟分盟“剧联”小组。在“九·一八”周年时，“剧联”分盟还领导各社作剧场突击演出和街头飞行演出。当时的北平“剧联”分盟实际上成为“剧联”北方分盟了，它担负着天津、济南、青岛、太原、绥远等地的分盟或小组的政治、组织领导工作。由于北平的党组织遭到破坏，“剧联”分盟受到影响，一些盟员陆续撤离。我于一九三三年一月由组织调到上海，担任了上海左翼戏剧运动的组织工作。

“剧联”杭州小组于一九三二年四月成立。主要成员有刘保罗、桂公创、龙作、辛汉文、易杰、田洪、舒绣文等。五月，成立五月花剧社，并接连在杭州两次公演，剧目是田汉的《一致》、《乱钟》等，获得很大成功。接着，在杭州的不少学校流动演出。八月，举行第三次公演，剧目是《战友》、《S. O. S.》、《婴儿杀戮》、《洪水》、《贼》等。上海的应云卫、唐槐秋等也赶去参加演出。不料在公演期间，大队警察包围了剧社，刘保罗、桂公创、龙作三人被捕，刘被判处徒刑四年。五月花剧社被迫停止了活动。到了一九三四年六月，我调任上海“文总”的组织秘书，“文总”派我到杭州去秘密建立了“文总”分盟及下属的“左联”、“教联”、“社联”、“剧联”、“美联”等分盟或小组。开展活动不久之后，即被破坏。

一九三二年夏，“剧联”武汉分盟成立，主要成员有吕骥、陈荒煤、姚禹玄（张庚）、郭安仁（丽尼）、盛家伦等。曾上演《乱钟》、《女工马德兰》等剧。后遭到反动当局的禁止和压迫，这几位成员都转到上海，继续参加左翼文艺运动，主要是在剧联。

一九三三年九月，“剧联”派宋之的、陈鲤庭去南京建立分盟，参加成员有施春瘦、瞿白音、舒强、吕复、许之乔、吴天等。分盟领导下成立了磨风剧社、大众剧社，开展戏剧活动。一九三五年春，磨风剧社被禁，施春瘦、瞿白音等被捕。

“剧联”各地分盟中以广州分盟遭到的镇压与破坏最重。何干之与袁文殊（舒非）逃亡到上海，刚接上“文总”与“剧联”的组织关系，不久袁就遭到逮捕，从一九三四年到一九三六年坐了三年监牢。

随着左翼文艺运动的开展，反动当局也加紧了文化“围剿”，剧团被禁、演员被捕，时有发生。如一九三三年八月，上海三三剧社被禁，领导人之一的周辉牺牲；光光剧社、骆驼剧社也被迫

停止活动。但在“九·一八”、“一·二八”以后，人民群众的抗日爱国运动不断高涨，话剧运动在压制和打击下，却和抗日救亡爱国运动结合得更紧，从而有了新的发展。一九三四年一月，在“剧联”领导下，由原“三三”、“光光”等方面人员组成无名剧人协会，我和章泯、徐韬等主持工作，为纪念“一·二八”，在九星大戏院等处举行公演。还曾在中华学艺社向美亚绸厂罢工工人作慰问演出。演出剧目有欧阳予倩的《同住的三家人》、章泯的《救命圈》、于伶改编的《银包》。聂耳曾带领了联华合唱团来参加我们的公演。在他指挥下，唱了《新女性》影片的全部歌曲。十月，徐韬、姚时晓等十六人到南市演出，全体被捕，无名剧人协会被迫停止活动。新地剧社改名大地剧社到南京大世界演出，回到上海北火车站时，南京钉梢来的特务，会同警察把全体演剧人员宋之的、陈凝秋、陈荒煤、沙蒙、郑山尊等二十余人逮捕。经社会各方大力营救，因宋之的在上海是第二次被捕，被解往苏州高等法院监狱，长期关押，其他人员具保释放。这时，盟员演员王为一因多次演出《月亮上升》，在几个大学被反动学生殴打，反动派勾结租界警方通令捉拿他。王逃往香港去拍电影。为了冲破日益加剧的白色恐怖，上级领导“文委”与“剧联”执委会一起商讨对策，在一九三五年一月，动员了影剧界知名人士应云卫、袁牧之、金焰、王人美、赵丹、金山等出面，组成舞台协会，租用金城大戏院，演出了田汉编剧的《水银灯下》与《回春之曲》，极盛一时。“剧联”执委会几次召开会议，总结了几年来单纯致力于工厂、农村、学校等社会宣传鼓动工作，以致多人多次被捕、牺牲这种单线作战的得失与教训，主张改变战略，注意大剧场演出，建立舞台艺术，争取观众。同时兼顾工农学生演出。可是正在作这种酝酿时，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九日，发生了组织大破坏，中共上海中央

局和省委机关的宣传部长朱镜我、文委书记林伯修，副书记阳翰笙，文委田汉、许涤新等三十余人在同一晚间被捕。夏衍摆脱追捕隐蔽起来。剩下周扬和我作善后，组织了“文委”临时机构，维持“文总”下各联盟组织。到这年四月间，“剧联”党团书记赵铭彝又被捕，决定由我接任（直到一九三七年冬上海沦为孤岛时止）。

一九三五年六月，经“剧联”的筹划，成立了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成员有章泯、张庚、赵丹、金山、王莹、吴涓、郑君里、魏鹤龄、叶露茜、顾而已、陈鲤庭等。从斗争中吸取了经验教训，我们改变了活动方式，注意了剧目的选择，先后演出了《娜拉》、《钦差大臣》、《大雷雨》等。我们给鲁迅先生送去《钦差大臣》的戏票，请鲁迅先生来看戏。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三日，星期天，下过小雨的晚上，鲁迅先生和许广平来看了戏。他首先肯定了这次演出的意义和成就，然后，对原作的理解，人物性格的处理，以及舞台布景、服装、化妆设计等方面提了几点意见。在业余剧人协会的基础上，“剧联”团结了更多的戏剧家，成立了上海业余话剧实验剧团，长期在卡尔登戏院连续上演许多世界名剧。

一九三五年底，鉴于民族矛盾已逐渐上升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为了团结抗日，开展救亡运动，扩大民族统一战线，“左联”、“剧联”等左翼文化团体决定解散。一九三六年初，以联谊会的方式成立了统一战线的上海剧作者协会。该会曾召集剧作者讨论，制定了《国防剧作纲领》。其原文目前尚未找到。但在《生活知识》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日第一卷第十期《国防戏剧特辑》的周钢鸣、张庚等的六篇论文中可以得知这一纲领的精神。特别是周钢鸣写的《民族危机与国防戏剧》，曾谈到国防戏剧的内容和六条创作要求，说明国防戏剧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剧作家，演出家，舞台技术家来发挥他戏剧艺术的武器，在民族危机

和争取独立中所应尽的任务，就是在保卫国土，唤醒大众作反帝抗日反汉奸，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与领土主权的完整。这就是‘国防戏剧’在一般戏剧中的特殊性”。同时，他还引另一位戏剧家的话，说明“国防戏剧是跟一般现实的戏剧一样，相互之间是有着极紧密的联系”。正由于民族危机日益紧迫，人民抗日救亡情绪日益高涨，也由于左翼戏剧运动在文艺工作者中间和人民群众中间有着深厚的基础和广泛的影响，当时的《光明》、《生活知识》、《妇女生活》、《读书生活》和《戏剧时代》等进步刊物上较多地发表抗日救亡的剧本，而这种创作活动又和群众的业余戏剧活动紧密地结合起来，因而国防戏剧得到了蓬勃地开展。但是，蓬勃开展的群众救亡戏剧活动却遭到了租界当局的压迫。本年六月，上海星期实验小剧场在新光大戏院演出《走私》、《秋阳》和《都会的一角》，开幕之前，租界当局下令停演，理由就因为《都会的一角》中有“东北是我们的领土”字样。事后，演出单位以及上海文化界戏剧界都联名向租界当局提出抗议，为争取演剧自由发表宣言。接着，上海蚂蚁剧社上演张庚根据俄国托尔斯泰剧本改编的戏，也遭到租界禁演。而日本影片把中国东北称为“新地”，公然演出。激怒了中国观众，各进步演出单位又陆续提出撤销租界影剧检查权的要求，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一九三七年初，业余剧人协会、中国旅行剧团、四十年代剧社、光明剧社、新南剧社等在上海卡尔登戏院联合演出，为时十天，演出剧目有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大雷雨》、阿英的《春风秋雨》、毛罕姆的《生死恋》、契诃夫的《求婚》、田汉改编的托尔斯泰的《复活》。这种联合演出的形式，震动一时，为团结进步戏剧界、提高戏剧表演艺术、扩大观众对象等起了良好的作用。“七七”事变后，上海剧作者协会扩大组织为中国剧作者协会，立即集体创作《保卫芦

沟桥》，由崔嵬、张季纯、马彦祥、阿英、于伶、宋之的、姚时晓、舒非等十七人参加写作；夏衍、张庚、郑伯奇、孙师毅四人整理成三幕连续剧，还附有冼星海、周巍峙等六人作的歌曲。由阿英起草的代序中，发出了中国剧作者“保卫祖国，一切不愿作奴隶的人们，起来”的呼声。郭沫若为剧本的再版本与观众说明书题了热情的词。经过短时间的紧张的排练，全上海各大剧团的著名演员合作于八月七日起，在南市蓬莱大戏院每天日夜两场演出，其间还特为欢迎回国的郭沫若和刚出狱的“七君子”沈钧儒、邹韬奋等临时加演了一场。同时，田汉、陈白尘、张季纯各人都写了有关芦沟桥的剧本。接着，在“八·一三”抗日炮声中紧急召开的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上，我被推为组织部长，我们很快地组成十三个演剧队（第十队、第十二队部分人员留沪工作），遵潘汉年转达周恩来同志意见，分赴内地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同时，我们组织了三个战地服务团，派往嘉兴、昆山等东战场抗战指挥部工作。一个京剧界救亡演剧队分赴上海各电台、伤兵医院、难民收容所演出。蚂蚁剧社的十三位人员组成蚁社救亡宣传队，由何惧、张庚任队长，一路工作到内地。其中张庚、何惧、苏理、陈锦清、张铮到了延安。由陈白尘、沈浮、孟君谋领导的上海影人剧团，到了四川。孩子剧团从他们服务的震旦大学难民收容所撤出来，分批离沪到南通天生港，集中后辗转到了武汉，在周恩来、邓颖超同志直接关怀下，开展工作。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七七”事变后《保卫芦沟桥》的集体创作与紧急联合演出是国防戏剧运动的总结，也是从左翼剧联成立以来我们长期在反日反文化“围剿”的白色恐怖中积聚起来的力量的爆发。多种形式的救亡演剧队、宣传与服务团的分赴内地活动，为中国话剧运动的大普及与大众化，播下了活跃的种子。当时各团队都有同志转到延安去深

造，以一队、二队与五队去的较多。“八·一三”全国抗战开始，中国的戏剧运动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在国民党统治区左翼戏剧运动蓬勃发展的同时，红色根据地的戏剧活动也有所开展。一九三一年夏秋间，中央革命根据地建立了红军俱乐部和工农剧社。一九三二年冬，“剧联”成员朱光、李春霖、汪曼生、严僧等，由组织调配去苏区参加戏剧工作。这时中央苏区成立了中央剧团和高尔基戏剧学校，曾演出李伯钊的《无论如何要胜利》、胡底的《红色间谍》、集体创作的《我——红军》和《南昌起义》、沙可夫的《武装起来》等。一九三四年二月，瞿秋白到瑞金任教育人民委员，很重视戏剧工作，亲自抓了剧团的建设和演出的剧目。红军主力长征后，许多戏剧工作者随军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有的中途在艰苦的斗争中牺牲，如钱壮飞同志等。

除左翼戏剧工作者以外，还有许多剧作家、导演、演员为中国的话剧事业作出过贡献。例如，南京国立剧校在万家宝（曹禺）、余上沅、马彦祥、应云卫等主持下，演出过洪深的《青龙潭》、曹禺的《日出》、易卜生的《国民公敌》、高尔斯华绥的《争强》；南京于一九三七年元旦成立的中国戏剧学会，马彦祥、曹禺等演出《雷雨》，曹禺亲自饰周朴园一角，都是取得了成绩的。又例如，上海戏剧协社成立于一九二一年冬，历经坎坷，时断时续，直到一九三三年九月止，前后活动近十年，举行公演十六次。该社最初由应云卫领导，欧阳予倩、汪仲贤等都曾加入演出，后来洪深也加入活动，曾演出过洪深根据王尔德剧本改编的《少奶奶的扇子》、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一九三三年为纪念“九·一八”二周年，最后大规模演出反映一九二五年英国兵舰炮轰万县，激起中国人民愤怒反抗的《怒吼吧中国》。这个剧本由应云卫导

演,事先经过夏衍、孙师毅、沈西苓、郑伯奇、严工上等的多次讨论,演出效果极佳。该剧上演时,正值世界反战委员会代表英国马莱爵士和法共中央委员凡扬·古久列领队来沪参加远东反战会议,并调查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件。剧中播放《国际歌》的唱片,又唱《马赛曲》等,演出气氛热烈。古久列同志等看了戏,深受感动,面对应云卫说了感激的话,并要他代向全体工作人员致意。应云卫在中国话剧运动史上作出的贡献,是值得 we 怀念的。

随着话剧运动的开展,剧本的创作也繁荣起来,涌现了不少优秀的戏剧家。田汉自发表《一致》,创作倾向改变后,以创作的丰富和作品上演率高,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他写的以抗日救亡为题材的《乱钟》、《扫射》、《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战友》、《一九三二年月光曲》、《回春之曲》、《水银灯下》等等,都曾风行一时,为全国各地的许多剧团演出。五幕剧《洪水》反映了大水灾中农民苦难的生活,同时也揭露了反动官僚侵吞公款的行径。独幕剧《旱灾》甚至写出了灾区人吃人的惨剧。由于作者不够熟悉农村生活,因而这类剧本写得较散漫。但它们在揭露反动统治的黑暗和反映人民的苦难上,还是很有意义的。我们在本集中选入田汉的四个剧本,《名优之死》是他前期著名的作品,《一致》、《乱钟》、《回春之曲》则是他投入左翼戏剧运动后不同阶段的代表作。

不少左翼戏剧家写的剧本,富于时代气息,能紧密结合当时的斗争,具有宣传鼓动的作用。本集中所选的冯乃超等的《阿珍》、欧阳予倩的《同住的三家人》、适夷的《S. O. S.》、袁牧之的《一个女人和一条狗》、阿英的《春风秋雨》等等,都是左翼剧社经常上演的剧目。在同类作品中,以《同住的三家人》写得较深刻。它写了军阀混战下城市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指出必须提高觉